

■电影

与电影《朝颜》有关的漫谈

□ 骆艳英

年逾花甲的孙桂萍特意从外地赶回新昌。她青春时，正是处处涂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。作为知青，她被下放到新昌县羽林街道拔茅村，经历过心智与体力的不断捶打。她与当地女青年戴云成了闺中密友，无话不谈。村民们还因此送了她们一对雅号——白蛇与青蛇，形影不离到要喝同一碗小汤圆。

多年后，闺蜜戴云成的儿子陈天衣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《朝颜》上映在即，她必须抛开所有家事，再远也要坐班车赶来道贺。她还要买电影票支持她从小看到大的天衣，而不是接受青春友谊的馈赠。这多像她的名字，一棵桂花树，平素安静地站在院子里，等到秋天，每一朵细小的绽放，都给这个季节带来微弱的香气，哪怕这个秋天不只是为了她构筑一幅阡陌之图。

赶来向天衣妈妈道贺的还有许多，亲友、乡邻、同学，还有她治愈过的病人……仿佛这不是一场电影的庆祝仪式，而是一位导演妈妈独自经历过世间所有的美好与葱茏、心酸与阑珊之后，被一个特殊的时间邀约，此刻聚集到她一个人身上，而呈现出的安稳与自在。

新昌是个小县城，老百姓听说身边凭空出了一个导演，他的电影还在国际上获得10多个大小奖项，在意外与惊奇中纷纷奔走相告。但在我看来，忘年朋友戴云成养育出一个做导演的儿子，是意料中的事。因为她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那种感染力，仿佛表演是上天降临在她

身上的一种漫不经心。有一次，聊起她在国外起急找不到公厕的经历，云成在我们面前又模拟了一次。她把裙子往膝盖前后一裹，微微蹲身，然后并拢膝盖，急忙走几步；聊起她学生时代的“演员”经历，她说因为身高不够，只能扮矮老头，一手捏烟袋，一手持烟棍，头点地走路……微乎其微的一件事，一经她肢体与语言的诠释，都会生动有趣起来。她的这种即兴又惟妙惟肖的表演才能，常惹得我们哄堂大笑。她的表演都来源于最普通的日常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：美，有着千差万别的解释。然而，这样一个她，竟是一位乡村医生，一家村卫生院的院长。有时生活就是这样，自己热爱的来不及实现的，会潜移默化给身边的人。儿子天衣无疑继承了妈妈身上的典型特征，并且经由生活，创造了自己第一部不受时空限制的、因真实触及灵魂而慈悲坚强的作品。

电影《朝颜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在北方相对封闭的农村，生活在同一个村的李八玥（袁梵饰）、陈家兴（陈天衣饰）、王玉海三人自小关系甚好。初中毕业，陈随家人搬至县城后与李八玥一直书信往来，懵懂的感情也逐渐清晰。由于陈在一次打架斗殴中进了少管所，李八玥去陈家，陈母不堪将真相告知，慌称陈外出打工。李八玥误以为是陈想与其分开找的借口，俩人就此别过。因父亲的陈旧观念，李八玥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，答应了对追求已久的王，与之结婚。此时，刚



出少管所的陈得知二人结婚，便不再联系二人。婚后得知真相的李八玥也渐渐面对现实，相夫教子，将自己的缺失与希望统统放在了女儿可心身上。六年后，王在一次医疗事故中过世，还在丧夫之痛中的李八玥感到单身公公对自己的异样态度，不得不重新踏上一段改变命运的人生旅程……

朴素，具备乡野草根气息的一个真实事件，有着活生生的残酷与致命的伤痕，这让陈天衣感触良多。为何不把李八玥的故事记录下来，以电影形式致敬女性碎玉飞花般凛然的生活姿态？在科技与文明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，相对封闭的中国北方农村里，她们又是怎么与命运

抗争的？对国内农村女性精神生活的多重思考，促使天衣着手剧本创作，历时三年，全方位本真地还原农村生活。2019年，他把影片寄给各个组委会，出乎意料地陆续获得多项国际电影奖项，如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情片、罗马国际独立电影节入围最佳故事片、美国国际独立电影奖最佳故事片、加拿大导演剪辑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情片（亚太地区）等。

我问天衣，这么多国际电影节为何要颁发你奖项？他说，我还差很多。一个优秀的导演需要文学底蕴、美学品位、技术专业知识，以及察言观色的微表情的理解用来指导和挑选人物。他感慨，当导演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学的，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没法学的。也就是天分，对电影这门艺术的感觉。他谦逊地说：“等我对这些应用自如的时候，估计头发都白了。”

天衣生于农村、长于农村，又在作品里回归农村，在透明的能够一眼望到边际的农村生活里扎根，挖掘底层老百姓，尤其是女性作为“人的精神”生活，对坚韧而酷烈的生命力予以赞美，通过影像重建艺术与现实的联系，为普通的生命注入了巨大的能量。我想这大概就是《朝颜》的获奖理由吧。

1982年生的天衣，已越来越多地对生命对生活保有敬畏之心。期待他日后拍出更多更优秀的电影，在艺术探索之路上越走越远。

（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）

■读书

择一事 终一生

——读郑嘉励新著《考古者说》

□ 潘江涛



（郑嘉励著《考古者说》，2020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

——

《考古者说》是考古学家郑嘉励的新著。读完最后一篇《考古人的独白（代后记）》后，我码下最初感受：“执着和专注、毅力和恒心，是择一事、终一生所必需的品质，也是令人钦佩的魅力所在。”

郑嘉励是浙江玉环人，1995年供职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后，“不曾跳槽，更无缘改行”。

我与郑先生素昧平生，但对其文字并不陌生。大约2010年，我在《杭州日报》副刊上读到了他的“考古者说”系列。“田野工作者”是郑嘉励的自我定位，既“非专业作家，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”，其文学成就也许比不上同版面上的知名作家，却被业界称作“主流学者、小众网红、学术畅销书作家”。后来，他把专栏文稿集结，先后出版了杂文集《考古的另一面》和随笔集《考古四记》。

收录在《考古者说》的文章，被剖为“寻墓”“语石”“读城”“格物”4辑。郑嘉励犹如一位烹饪大师，以古代物事为食材，灵活运用中华料理十八般技巧，将田野、读书、考古、历史、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一一整合起来，烩成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。读之，不免让人感到：考古原来这么有意思！

创地、开墓、棺木、厉鬼、太平间、火葬场……大凡与死亡有牵连的事物或意象，考古工作者几乎天天都要碰到。说

“有意思”，其实是假的。之所以让人产生“错觉”，盖因郑嘉励俯仰天地，穿越古今，妙语连珠。

二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考古工作，不能只挖土，还得会读书。郑嘉励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便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、文物志和古籍。他常常自嘲，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最近、最有“人民性”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。

“属地管理”是文物考古工作的特质，郑嘉励足迹又局限于浙江范围——“偏安一隅”，难免影响拳脚施展。但是，“读书”，让郑嘉励在田野中发现问题；“行路”，又确保他将一个个古老而严肃的话题皆落脚于人文关照，感性的表达和富有情趣的笔法让人耳目一新。

“上班就是上坟”，是郑嘉励先生的名言，亦是网络热词。在《考古者说》中，郑先生以它开篇，用意显而易见。因为这话虽“略带自嘲之意，整体而言，还算是对工作的客观描述。”

按旧时说法，凡是无人收葬、祭祀的亡魂，都会变成到处作祟的厉鬼。于是，热心建造“义冢”，便成为古代城乡常见的慈善行为。

有一次，郑嘉励到义乌赤岸，还见过“厉鬼坛”，那是过去祭祀孤魂野鬼的所在。他说：“建造义冢的好心人，对孤魂

野鬼心存善念、敬畏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而，敬爱与畏惧，这两种不同的情绪，容易混为一谈。古人收殓陌生人的骨殖，一半因为敬重，一半因为恐惧。好比苍天在上，我们也很难说自己是敬重大自然呢，还是因为害怕大自然；又好比我们坐在台下，听主席台上的领导讲话，皆作洗耳恭听状，你说我们到底是因为爱他呢，还是因为怕他？”（《义冢》）

听出来了，郑嘉励的文字借古讽今，有大先生的遗风。

三

古婺，“浙江之心”——2200年，是历史长度；万年上山，乃文脉厚度。较之于其它地市，郑先生对金华是偏爱的，“说”得多，分量也最重。

武义不大，但文脉悠长，是郑先生频频光顾的重要“考点”。徐谓礼文书是武义博物馆镇馆之宝，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想当年，盗墓贼得手后，销赃者认定鲜美如昨的文书为“赝品”。郑嘉励慧眼识宝，终于促成公安机关立案侦办——案情扑朔迷离，文书失而复得。每次前往参观，听人讲解文书内容，不仅简明易懂，而且引人入胜，有一种与众不同之感。

2019年4月，郑嘉励应武义博物馆邀

请，领着讲解员在展厅转了一圈，针对众人疑问，一一作了解答。一篇涉及南宋政治、官制、文书、墓葬制度的解说词便水到渠成。郑嘉励说：“最好的讲解，是口语的，是闲聊的，是生活的，是不着痕迹的精心准备。”

近年来，郑嘉励扎根金华古子城的几个“点”，又兼顾老城区的整个“面”，带着问题，走透了每一个角度、每一处古迹，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得的《金华四记》。

不过，如果说武义是郑嘉励先生的“福地”，那么，金华古城无疑令他“揪心”。城墙的四至，即老城区的边界，曾为城市最直观的象征。金华旧城墙拆除，护城河填平以后，还记得古子城城墙现在何处？而今，哪里去寻和吕祖谦相关的一览亭、吕成公祠、丽泽书院等遗迹？

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，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。郑嘉励是专家型学者，“四记”中的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，给金华人留足了面子。郑嘉励说：“时代发展太快，又有人主张放慢脚步……呼吁重建金华府衙、府学。然而，事过境迁，重建的‘古迹’也不过是昨日蜕变后留下的躯壳，历史已永远无法重来。”

诚哉斯言！

（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）